

教学与研究并重:我与教学论

——访李定仁先生

李定仁¹, 曾云¹, 刘旭东¹, 郝文武²

(1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李定仁先生投身西北教育 50 余年,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工作中坚持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为我国教学论专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因此我们专访了李定仁先生,与先生就学术研究、研究生培养以及教学论专业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交流。

关键词: 李定仁; 教学研究; 研究生培养; 教学论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087(2019)03-0001-07

收稿日期: 2019-06-10

作者简介: 李定仁,男,湖北武汉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曾云,男,甘肃民勤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研究生;刘旭东,男,广东揭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文武,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10.16222/j.cnki.cte.2019.03.001

李定仁先生 1956 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1960 年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就扎根西北一辈子,退休后也一直在西北师范大学,为西北的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五十余个春秋。为充分了解李定仁先生对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的主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018 年 7 月 8 日陕西师范大学郝文武教授一行到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专访李定仁先生。李先生与郝文武教授一行及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就先生的学术经历、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和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今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现将访谈与交流内容整理如下。

访谈者: 感谢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先给我们谈谈您的学习和教学经历。

李先生: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一个是我的学术经历,一个是我带研究生的一些经验,第三个是我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看法。

一、我的学术经历

我是湖北人,1951 年我 16 岁的时候,参加中国

人民解放军,后保送至第一军医学院(后改名为第四军医大学)学习。由于一场大病,1956 年被迫从部队转业后考入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1960 年毕业留校任教。我先后任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主任和教科所所长等职务达 13 年,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系统地开设了《外国教育史》《西方教育名著选读》《西方现代教育流派》《教学思想发展史略》《教学论》等课程。我在教学中注重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效果较好,受到学生的好评。同时,我还积极参与甘肃省高校师资培训工作,连续三年为甘肃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讲授《大学教学原理与方法》课程,培训高校青年教师 300 余人。教学方面大概就是这些,时间也就都用到这些上面去了。由于在教学上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可能也有一些成绩,到我即将退休的时候,给我评了一个“甘肃省教学名师”。

访谈者: 李老师,凡是听过您课的人,对您教学的条理性、启发性和语言表达的艺术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学术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著述颇丰,您给我们谈谈您的学术研究经历。

李先生:我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涵盖了外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教师教育、民族教育等方面。

(一) 外国教育史研究方面

20世纪80年代,国外教育家的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并逐渐产生影响。我首先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卡贝等人的教育思想研究出发,分析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思想源头及共同主张,接着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体系和特点,再进一步研究了苏联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凯洛夫、赞科夫、巴班斯基、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家的思想。较早地向国内系统介绍了世界教学理论及实践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进展,期间着重考察了外国主要教学流派与重要教育家的教学思想。

在国内,我是较早开设《西方现代教育流派》这门课程的。对于外国教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注重“洋为中用”的原则,在仔细研究分析每一个思想流派背景的同时,还要强调外国教育对我国教育政策的借鉴之处。例如,对要素主义教育思想评述时,剖析了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背景与原因,比较要素主义与进步主义在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纪律等方面的差异与对立,分析了要素主义教育主张传递文化要素是教育的核心,注重“天才”儿童的培养,指出要素主义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对人的丰富才能资源的开发,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等等,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永恒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抗争,着重分析了进步主义适应论与永恒主义永恒论在教育目的观、教学过程观、课程设置上的对立及其理论基础,比较了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的异同,指出:永恒主义偏重于古典的、人文学科的知识,要素主义则偏重于现代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样的比较分析对于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知识与素质等诸多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赞科夫、巴班斯基的教学论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特别是对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的系列研究涉及巴班斯基的教学方法体系、教学过程最优化思想等方面。巴班斯基提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把教学过程看成一个系统,综合地研究教学过程,有助于找到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全面看待教学职能,以最大的教学效果促进理想的教养、教育和发展;重

视研究学生,摆正教与学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与总结,对于指导当前我国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 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方面

我从1985年开始协助李秉德先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教学论》一书的编写工作。此书从1985年立项,到1990年7月定稿,前后长达5年之久。1991年9月,此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先后印刷20多次。此书的出版影响较大,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西北师范大学在全国教学论界的地位。这个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系统论的观点全面研究教学论的各个方面,试图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教材体系,而非根据教学工作需要进行简单的排列。这部教材出版以后,影响比较大,并多次获奖。1993年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4年获中国教育学会优秀专著奖,1997年获第一届全国高校教学成果奖,1999年被教育部列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习参考书。这是我学术经历当中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对教学理论的研究,我特别关注教学生“学会学习”的问题。1994年,我在《西北师大学报》发表了《论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学习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教学的指导思想问题;教会学生学习是教学的实践要求,更是教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教师既要研究如何教,又要研究学生如何学,使学生掌握学习规律,懂得如何学习,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进入21世纪,我们国家开始了酝酿新课程改革,在批评应试教育的基础上为推行素质教育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提出了“教学研究”的思想。2000年,我在《教育研究》发表了《论教学研究》一文,详细论述了教学研究的特点、教学研究的意义、教学研究的内容、教学研究活动的开展等问题,率先提出中小学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意义和特点,并强调教学研究的创造性及对教学的改进功能。我特别强调,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向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必须抓住时机,加强教学研究,把强化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放在首位;而且在中小学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必须要领导重视,方法得当,形成制度,这样才能持之以恒。

教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有理论视角和现实视角,更要有历史的视角。只有把理论、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学术研究视野。1989

年11月,由我组织国内最有实力的一批教学论学者,负责主编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重点项目:《教学思想发展史略》一书,1993年2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系统地考察了教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观点,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中西两条线索比较研究,体现了中国传统教学论的思想体系。此书涉及教学基本理论问题各个方面,以教学目的、课程、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模式、教学艺术、教学评价等教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为中心,分别介绍了古今中外有代表性、有影响的教育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作,探寻源流,理清脉络,服务现实,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史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发展史略的重要成果,在教学论界有较大影响,曾获得甘肃省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一等奖。这也是我经历中比较大的事件。

对于当代教学论发展的研究也是我关注的学术领域,为了反映我国教学论与课程论的研究成果,从当代学术史的视角审视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从2000年开始,我又开始筹划主编《教学论研究20年(1979—1999)》《课程论研究20年(1979—1999)》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课程论、教学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分专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通过回顾过去,总结经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试图给人以新的启示。这两本书是西北师范大学教学论博士点集体研究的成果,参加编写的人员均是教育学博士和在读博士生。这两本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12月和2004年12月出版。由于这两本著作以专题为线索,以时间为顺序,材料丰富,论证严密,风格独特,被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用作教学参考书。

(三) 高等教育方面

1995年我在《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发表了《论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若干趋势》,提出了在当代科技革命背景下,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应该体现教法和学法同步改革相辅相成,多种方法的合理结合的显著特征。2001年,我又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了《试论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特点》,指出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在教学目标上,要有明确的专业性;在教学内容上,要有一定的探索性;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学生的学习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教学形式上,要有更多的实践性。关于高等学校教学方法

的改革问题,我分析了大学教学方法的特殊性,尤其倡导问题教学法、协同教学法、个案教学法,阐述了各种教学方法的特点、实施步骤、操作原则与要求。1994年由我主编的《大学教学原理与方法》一书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就是我长期致力于探索高等学校教学规律,不断总结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成果。该书全面探讨了大学教学的目标、课程、原则、形式、方法、技术、艺术、风格、心理、师生关系、智能培养、学习评价等问题,拓展深化了对于高等学校教学的研究,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大学教学的著作,荣获了甘肃省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 教师教育方面

教师的培养与专业发展是教育教学实践的核心问题,也是教育教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针对我国师范院校普遍轻视教育课程教学的现实问题,我早在1984年第1期《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发表了《师范院校必须加强教育课程教学》的文章,指出无论从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是从师范教育的任务来看,或是从当前各国师范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必须加强教育课程的教学。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轻视教育课程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课程的建议:增加课时,开好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课程;改革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健全组织,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制订措施,提高教育课程的地位。这些建议直到今天都还有现实意义。

针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师范教育逐步走向开放,师范院校也纷纷开始综合化的探索,师范生的培养出现了明显的“危机性”现象,我在1989年第2期《西北师大学报》发表了《师范院校应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明确提出“师范院校必须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方向”的主张。从师范教育的产生、发展,从师范院校的性质、任务,从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现实诸方面论证了师范院校为什么必须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思想。指出:就整个高等师范教育的现状来看,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着盲目追求高层次和向综合大学看齐的做法,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观念淡薄;在思想教育方面,学生的专业思想普遍较差,没有树立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思想;在教学内容、培养规格方面,脱离中学实际,作为合格的中学教师基本训练不够。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基础

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因此,进一步明确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思想,仍然是师范院校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师范院校的责任和使命。在师范院校愈来愈“综合化”发展的今天,如何继续坚持师范院校(专业)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仍然值得研究。

除了对教师培养的立场性和方向性问题的研究,我还非常注重对“教师”本身的角色与素质的研究,重视挖掘教育家的教师教育思想,开展了教育家论教师的系列研究,如叶圣陶论教师、第斯多惠论教师、马卡连柯论教师、赞科夫论教师等教师教育思想。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教师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教师修养、教师政策和优化教师培养、培训过程与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研究资料。

(五) 民族教育方面

由于本人长期在西北工作,对西北地区和西北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尤为关注。在1994年,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资助,我带领本院几位年轻教师和博士生深入实际,对西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现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西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报告基于对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背景与特征分析,提出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同时,指出民族教育的文化特征是民族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难题,将民族教育中学校缺乏吸引力,办学效益差,学生流失严重、教学质量低下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对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思路的科学论证,进而提出了发展西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模式与对策,主要包括:内地对口支援发展模式、以寄宿制为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两个为主“一通一懂”的双语教育发展模式、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女童教育发展模式。这项研究直接指向西北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当时面临的迫切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对策建议也有力地支持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份报告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且易操作,被当地有关部门采纳,并于1996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个教育研究上的项目获得此奖,是前所未有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带出了一支研究团队,现在已成为我国民族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在1997年,我又主编出版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教育》一书。这本书从宏观上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对西北少数民族教

育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双语教育问题、文化与课程问题、女童教育问题等逐一开展研究,提出了发展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的思路。该成果获得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我退休前夕,又承担了全国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研究”,我带领研究团队结合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以西北多民族地区的学校为案例,深入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和行动研究,对西北民族地区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现状与问题、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问题、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模式问题、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问题等进行了深度研究,形成了民族教育领域校本课程开发的成果《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研究》,其成果于2006年5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理论,即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背景、现状及开发的模式建构。第二部分是西北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案例,对青海、宁夏、甘肃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情况予以总结与述评。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缺了新疆的情况。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校本课程,既要挖掘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资源,保持对本地文化传统的尊重,消除不同知识之间存在的高低之别,还要依靠教师与家长、社会人士的支持和学生的积极参与;课程开发的过程中还要调整课程的内容,使各种有价值的知识都进入课程体系,形成一种互补的、共同进步的状态,处理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之间的关系。课题完成后,我就退休了。

我的学术经历大概就是这样。在我从教50多年中,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其中主要文章,经甘肃省委宣传部批准,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编入《陇上学人文库:李定仁卷》。此书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关于研究生培养问题

访谈者:李老师,您也是国内比较早开始指导研究生的老师,请您给我们讲讲您指导研究生的一些经验。

李先生:指导研究生这件事,也是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教学论这个博士点是1981年全国第一批的教学论博士点。我从1986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

开始招收教学论博士研究生。从1986年开始,到2007年退休,经过我指导和培养的硕士研究生20名,博士研究生30名。目前,这50名中2人去世,3人从政。在余下45人中,担任教授43人,副教授2人,有10多人担任各高等师范院校教科学院院长,如中国教科院、山东师范大学、重庆教院、北京教院、云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浙江工业大学等。这些青年骨干,现成为国内教育理论战线上一批有力的生力军。培养了这么多人,大多数都留不下,甘肃这个地方经济不发达,经济是基础,留不住人,也很可惜。

这几十年我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呢?确实是下了功夫,耗费了心血的。主要的经验就是要严守从录取到毕业的各个环节,做到保障质量,宁缺勿滥。研究生学习的环节包括录取、课程学习、开题、撰写论文、毕业论文答辩等各个阶段。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要求,不可松懈。以课程学习环节为例,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都有系统的课程学习,大约有3个学期,要坚持上课,要从理论上给他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基础厚,以后才能站得稳,看得高。在课程学习阶段,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的关系上,要以理论学习为主。既要塑造研究生良好的专业知识基础,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又要注意培养研究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要根据每个研究生的个体情况,制定各自的学习方案,给他们指定书目,夯实他们的理论基础。

二是在系统学习与专题研究的关系上,要以专题研究为主。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除使他们掌握坚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但是,这种科研能力的培养不能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实现的。研究生在系统学习过程中,通过专题研究使其及早接受科研训练,让研究生处在本学科前沿,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三是在课堂讲授与自学的关系上,要以自学为主。研究生教学的根本特点是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的辩证统一。研究生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每一位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制定学习方案,指定必读书目。这种学习,既体现导师的指导,又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学生的自学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我曾承担过几部大型学术著作的编写任务,例如,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教学论》《教学论研究20年(1979—1999)》《课程论研究20年(1979—1999)》等。在编写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我们组织在读博士生参加这些著作的编写,把编写著作的过程变成学术大讨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人钻研思考,个个发表见解,形成一个非常活跃的、融洽的学习氛围。这样一个学术讨论过程,又成为一个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逐渐形成学术梯队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编写过程,使研究生不仅学会了如何编写著作,同时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学问,由此培养了一支在全国教学论界很有影响的学术队伍。有一位研究生名叫王鉴,从硕士生到博士生跟随我学习了6年,毕业以后,由于业绩突出,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教育理论界第一个获此荣誉的青年学者。我另一个博士生肖正德,入学前曾在农村中学任教多年,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我鼓励该生博士论文选题侧重在农村教育方面。该生以“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出版后,获得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这是我从课程学习这个环节来说的,我在培养研究生的各个环节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大体上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个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三、关于教学论学科今后发展趋向

访谈者:李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对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今后的发展,您是怎么看的?

李先生:对于教学论这个学科今后怎么发展?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讲这么几个方面吧。

第一,建设我国教学论学科,必须正确处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一方面,对国外的优秀文化要善于吸收其合理的精华。这是因为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中国教育只有与世界教育互相借鉴才能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学习国外的优秀文化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决不能机械照搬。我国百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我们不可能靠引进外国教学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教学实践。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一定要立足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教育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是今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就要处理好批评与继承,中国和外国这样一个关系。

第二,建设我国教学论学科,必须扩大教学论

的理论基础。过去,我们以认识论的一般规律来解释教学活动现象,将研究对象局限于纯认知过程,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教学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综合性,需要广泛吸收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脑科学的研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等等,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不能仅仅是过去单一的认识论基础。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教学对象及其规律。

第三,建设我国教学论学科,必须重视研究认识活动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论的任务是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既要研究教师如何教,又要研究学生如何学。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促进,密切相关。

第四,建设我国教学论学科,必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彻底打破“书斋式”研究。教学论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要只是为理论而理论,而要参与教学实践、研究教学实践、变革教学实践。这样,教学论才有活水源头,也才有生成与发展的空间。因此,在教学领域的一切改革,应提倡实验研究,改变主观意志和“坐而论道”、空泛议论的风气。任何一项大的改革,一定要注重实验,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实验,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改革决策不能依靠少数专家闭门造车,这样很容易脱离实际的。我们说实践出真知,从国外的理论来看,也是这样的,比如赞科夫的教学实验搞了十几年。所以,现在的改革一定要注重实验。

第五,建设我国教学论学科,必须重视新兴技术对教学论发展的影响。随着21世纪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云计算、移动网络、物联网技术等将广泛应用于教学,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课程教学论的许多因素都在发生显性和隐性的变化,从而引起课程教材的变化、教与学方式的变化。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的学校已经开始实验,让每一个学生使用上网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从而进行一对一个性化教学。这种学习模型中的相关联系表明新兴技术如何将学与教的各个要素连接。它表明在数字化时代,学习者如何利用新技术与教学活动的相关要素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在十多年前的教学论中几乎是很难想象的情景。所以,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发展,去深入研究新兴技术对教学论带来的影响的变化。

大体上就谈这些吧,也可能丢三落四,也可能

谈得不系统。

访谈者:李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在您做学问的过程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或者事件?

李先生:1960年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颁布了一个条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高教六十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加强教师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我留校当助教,要配备指导教师的。当时还有个规定,理论课教师前两年是不能上课的,要进行严格的教学训练,怎么训练呢?首先要系统听一门主讲教师的课,为自己将来讲课做准备。第二要参与指导教师的辅导活动,第三要参与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试考核活动。经这样两年教学训练以后,还要进行上课前的试讲,经过教研室评议通过后才能取得上课资格。当时,给我配备的指导教师是陈震东先生。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爱国华侨,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我校教育系担任教育史教研室主任,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当时对我明确提出三项要求:第一,担任高校教师其专业理论基础一定要厚实。他当时给研究生讲授“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要求我随班听课学习。第二,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一定要精读原著和第一手材料,不可人云亦云。第三,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一定要掌握好一门外语,这样才能眼界宽,便于与外界交流。当时,我当助教期间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对我后来的业务提高有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自学能力。老师只是给你指点迷津,明确方向,剩下的就要看你自己怎么走了,因为你遇到的问题是你以前不知道的。我开始不是研究教学论的,我是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对于专业来说,这个转向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当时让我转到教学论呢?因为,当时的博士生导师是要中央批的,而当时我们学校教学论专业的博导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后备的人,学校要找一个60岁以下的教授,当时60岁以下的教授非常少,我刚好50多岁,就把我转过来了。所以,要培养自己很强的学习能力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

还有,就是要虚心向老一辈学习。当时我们教育系有很好的师资条件,从美国、瑞士、苏联等国外留学回国的很多。这些老先生思想境界很高,虽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把自己一生贡献给祖国西北的建设事业。他们这种高尚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访谈者:李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

李先生:课程论是研究教什么的问题,教学论是研究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和怎么教应该是不好分的,但是现在好像要硬要分开。以前在编制课程时中小学教师是被排除在外,中小学教师只要教就可以了,现在稍微好一点,中小学教师也参与到了课程中,但是我前面说了课程改革一定要经过实验。

访谈者:李老师,您再给我们谈谈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李先生:可以说,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评估学校都是以科研为指标,评价教师都是以科研为指标。这就会带给老师一个很大的困惑——到底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如果老师的心思都不在怎么搞好教学,而是瞅着怎么多发几篇文章上面,我觉得这个办学方向就有问题。我已经退休10年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当政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教育部长讲“本

科不牢,地动山摇”,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我们的本科教学到底滑坡了没有?你到学校的课堂,特别是上大课的时候,你去看看,有多少学生在听课?多少人在睡觉、玩手机?我们的本科教学到底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办学的方向问题。

教学和科研是一个统一体,教学可以促进科研,科研可以带动教学。就是说教师的学术水平高,那么他的教学内容肯定是丰富的,这就是科研能够带动教学,促进教学。反过来,老师的科研往往是他教学中的问题,我在教学中遇到了问题,我通过研究也就提高了我的科研水平。应该是一种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带动教学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二者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访谈者:非常感谢李老师,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谈了自己的学术经历,谈了自己培养研究生的一些经验,还有对教学论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些个人主张和见解,使我们也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再次感谢您!也祝您身体健康!

[责任编辑 向宁]

Equal Stress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 Interview With Li Dingren

LI Ding-ren¹, ZENG Yun¹, LIU Xu-dong¹, HAO Wen-wu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2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Professor Li Dingren, an important educator, has dedicated to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orthwest China for over 50 years and has cultivated many talented people. He insists that teaching and research are entwined and mutually promote each other. It is a great honor to have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him about the academic research, graduate students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ies of pedagogy.

Key words: Li Dingren; teaching research; graduate students cultivating; development tendencies of pedagogy